

乾隆朝钦定四书五经满文重译稿本研究

徐 莉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 北京 100031)

[摘要] 有清一代, 大量汉文典籍翻译成满文。四书五经在清朝初期就有满文译本。乾隆皇帝即位后, 下令对四书五经的满文译文重新进行了修订, 并亲自披阅修订译文, 形成了重译稿本留存清宫。现藏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的四书五经修订稿本展现了厘定译文的动态过程, 还反映了满汉民族语言文化的融合。本文拟介绍该稿本, 对比满文修订前后的变化, 阐释四书五经满文本的文化传播功能。

[关键词] 清代; 钦定图书; 四书五经; 满文; 稿本

[中图分类号] H221.5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280X(2010)01-0062-09

历代封建王朝都是以儒家倡导的仁义道德、纲常名教作为巩固其统治的精神支柱。有清一代, 统治者更懂得崇儒重道、昌明性理对于巩固统治的重要作用, 他们大力提倡儒学, 孔孟经书和程朱理学著作几乎全被译成满文。四书五经就是其中重要的组成部分。

四书五经是儒家经典著作。四书即《大学》、《中庸》、《论语》、《孟子》的合称。五经即五部儒家经典:《诗》、《书》、《礼》、《易》、《春秋》。汉代以来, 四书五经就一直为统治者所重视。有清一代, 满族作为关外少数民族入主中原的统治者, 也意识到以儒家思想来统治汉族为主体的中原地区的重要性。自顺治皇帝开始, 四书五经就一直是进讲的重要内容之一。

在乾隆以前, 四书五经已有满文译文。现存满文图书中就可以见到顺治十一年(1654)内府满文刻本《诗经》二十卷; 康熙十六年(1677)内府满文刻本《日讲四书解义》二十六卷; 康熙十九年(1680)内府满文刻本《日讲书经解义》十三卷; 康熙二十二年(1683)内府满文刻本《日讲易经解义》十八卷。虽然《四书》、《书经》、《易经》以解义形式刊布, 但是满文本的体裁已备。乾隆皇帝即位之后, 命儒臣依照新清语厘定四书五经清文译文, 并由武英殿刊刻出版。

有关满文四书五经不同版本差异的探讨, 目前仅见庄吉发先生《清高宗敕译〈四书〉的探讨》一文^[1]。文中利用康熙年间满文本《起居注册》、《清文日讲四书解义》与乾隆年间《御制翻译四书》互相比较, 列举满文译文差异之处, 从满文虚字或介词连写、音译词改为意译词、改变语法句型结构、调整语气轻重等方面进行比较, 探讨其异同。文章引用语料详细, 阐释清晰, 为我们了解康熙年间至乾隆年间《四书》译文的变化提供了很多信息。

本文所写与庄先生不同的是, 笔者所用史料为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重译四书五经的清汉文稿本。除了如庄先生文中所述译文差异之外, 稿本中原有译文与修改译文同时存在, 为我们展现了厘定译文的动态过程, 宏观全面地展现满文译文的修改状况, 为了解四书五经的详细厘定过程提供参考依据。该部分史料深藏宫中, 为世人所未见, 笔者谨以此文对该稿本作以简介, 以飨读者。

一、稿本特征及其年代推断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四书五经重译稿本有两种不同的版本形式。其一为《四书》、《诗经》、《书经》、《易经》的重译稿本^[2]。该本为满汉合璧本，经拆装，每页满汉文共6行，页面27.9×12.7cm。其中，《四书》41件，包括满汉合璧《御制翻译四书序》1件。《诗经》97件，包括《御制翻译诗经序》满汉文各1件。《书经》只存满汉合璧《御制翻译书经序》1件，未见内容部分。《易经》41件。其二为《礼记》、《春秋》的重译稿本^①。《礼记》，精写本，满汉合璧，线装，页面31.5×18.7cm，每页满汉文共8行，现存三十七册。《春秋》六十四卷，精写本，满汉合璧，线装，页面32×19cm，每页满汉文共8行，共一百零八册，其中部分残损严重。

稿本中满文译文有很多修改的痕迹。多处译文修改之处贴有红色、黄色浮签，浮签上为该处拟修改意见。部分内容修改之处在天头位置贴有黄签，写有修改意见的说明文字，或是征询皇帝的修改意见。行文中多处有朱笔修改的痕迹。

该稿本书写工整，字体端正，均无行格。《春秋》本内有夹条，写“春秋陈设正本”字样，应为文献馆时期整理该本的工作人员进行登记的记录。根据该记录可以推定，该本应为宫中某处陈设之本。

这部分稿本的独特之处在于，满文原译文与修改后译文同在一个版本内出现，对比本内译文内容，就可以了解四书五经译文的修改情况。稿本中并未标明朝年。笔者在多种版本的对比和乾隆朝档案中，寻得蛛丝马迹，以推断朝年，让这些尘封的珍贵文献找到历史中的确切位置。

乾隆时期，满文的使用已很广泛，也达到了很高的水平。然而，由于满语文的发展迅速，多数新造的词不统一，且不规范。乾隆皇帝召集深通满学的学者，对满语文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整理，规范了新造的满语词汇，并译为汉语，统一确定其意义。整理之后的满语称为“新清语”。四书五经满文译文的厘定刚好反映了“新清语”的规范和使用状况。在四书五经的重译稿本中有《御制翻译四书序》，经对照与乾隆二十年武英殿刻本《御制翻译四书》乾隆二十年十二月十四日的序相同。序言中称：

“朕于御极之初，命大学士鄂尔泰重加厘定，凡其文义之异同，意旨之浅深，语气之轻重，稍有未协者，皆令更正之。然抑扬虚实之间，其别甚微，苟不能按节揣称，求合于毫芒，而尽祛其疑似，于人心终有未谦然者，几暇玩索，覆检旧编，则文义意旨语气之未能吻合者，仍不免焉，乃亲指授翻译诸臣，参考寻译，单词只字，昭晰周到，无毫发遗憾而后已。”

从序文中我们可以了解乾隆年间改译《四书》的经过。乾隆皇帝命大学士鄂尔泰重加厘定，对其中文义之异同，意旨之浅深，语气之轻重，不和谐之处都进行了更正。此序言应为厘定完毕时所作之序。那么四书五经的重译从何时开始呢？

辽宁省档案馆所藏《黑图档》中有关于乾隆朝“钦定新清语”的档案史料。其中有记载，乾隆十四年（1749）三月初八日会计司抄送“钦定清语”文内有如下清语词汇：诗经 *irgebun i nomun*、论语 *leolen gisure*、易经 *jijungge nomun*、书经 *dasan i nomun*。乾隆十四年四月初一日文内记载：乾隆十四年正月二十九日内阁抄出：四书 *duin bithe*。乾隆十四年七月十七日文内有：左传 *dzo kio ming ni araha ulabun*、周礼 *jeo gurun i sorolon*、易经 *jijungge nomun*、礼记 *dorolon i nomun*、尧典 *yoo han i kooli*、诗经 *irgebun i nomun*、书经 *dasan i nomun*、春秋 *šajingga nomun*。^[3]这些重译的书名与本文所介绍的稿本中修改之后的书名相同。这些档案资料表明，在乾隆十四年时对于这些儒学经典的名称已经在修改之中了。

在《乾隆朝上谕档》中有进呈翻译四书五经的记载：乾隆十六年（1751）闰七月初二日，内阁奉上谕……现在军机大臣等逐日有进呈翻译五经四书……^[4]（P945）据此可以推断，最晚在乾隆十六年

时《四书》满文译文已经在厘定之中了。乾隆三十三年(1768)仲冬月《御制翻译诗经序》中载：“岁庚辰，馆臣以翻译《易》《书》二经竟，请从事于《诗》。……越戊子，全帖始竣。”庚辰为乾隆二十五年(1760)，戊子为乾隆三十三年，为写序刊印之年。《诗经》满文译文的厘定历经八年之久方才见印本。

乾隆朝四书五经译本最早为《四书》，乾隆二十年(1755)刊印。《书经》乾隆二十五年刊印。《易经》乾隆三十年(1765)刊印。《诗经》乾隆三十三年刊印。《礼记》乾隆四十八年(1783)刊印。《春秋》乾隆四十九年(1784)刊印。四书五经厘定满文译文持续三十余年，每每进呈译本都经皇帝披阅方才定稿。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四书五经重译稿本，为我们展现了乾隆皇帝参与修订的儒家经典著作满文译文修改的全貌，清晰反映了清代前期和中期满文词法、句法的变化，是研究满语满文发展变化的珍贵资料。

二、稿本修改内容探讨

四书五经重译稿本主要以满文译文的修改为主。正如《御制翻译四书序》中所述“凡其文义之异同，意旨之浅深，语气之轻重，稍有未协者，皆令更正之。”稿本对满文原译文从满文的拼写、词义的异同、语气的轻重、句法的和谐等多方面都进行了修改。

列举其中部分内容，以展现重译满文的概况。

(一) 改写满文的拼写方式

把分写词改为连写，使其更符合满文拼音文字的连写习惯。如《论语·第三分》内有：

tai miyoo (钦定成语 taimiyoo)。②

大庙

《下论语·第十一分》内有：

kungdzi (钦定四书 fudzi) hendume.erdemu (拟改 erdemungge) erdemu akū seme.

子曰

才不才

inu gemu (签一在下：钦定四书 meni meni) (签二在上：拟改 meimeni) jui sembi.

亦各言其子也

“太庙”的分写方式改为了连写。meni meni 本为叠字，改为 meimeni。文中也有把助词连写在实词之下的修改，如：niyalma i doro 改为了 niyalmai doro。

汉字是方块字，每字单独书写，而满文为拼音文字，连写更能体现其书写特征和语言习惯。原译文的分写方式，表明原来翻译汉文时，译文受汉文影响较大，而此次重译时，文字书写方式更贴近满文习惯了。

(二) 意译词代替音译词，钦定新清语代替原有清语

稿本中音译词被修改的数量很多。上文内列举各书名就是把以前的音译改为了意译。一些还在天头位置贴有浮签，说明了改译的缘由或依据。如《大学·第一分》内有：

dai hiyo (拟改 amba tacin i bithe)

大学

天头黄签：程子谓大学为初学入德之门。朱注云：“大”旧音“泰”，今读如字。又云：大学者，大人之学也。此大学不指国学而言。今照字义拟改 amba tacin。至于《小学》一书，似亦应改作 ajigan tacin i bithe。

“大学”原为音译词，拟改时在浮签内说明了改写的依据，并联想到了相关联的“小学”的译法，也作了相应的修改。

《春秋·第一百七十一分》内有:

yen yang (拟改 a、e) de hamirakū turgun

阴不堪阳

a 满语中为“阳”，e 满语中为“阴”之意。原有音译词被替换为满语本身的基本词汇。

原有译文中，“tan 坛”均拟改为“muktehun”，“miyoo 庙”拟改作“juktehen”。

修改译文的过程中，奉旨修改了一些词。如《诗经小雅·第二分》:

moo sacici tang ting (拟改 ting tang ting sembini)

伐木丁丁

后又在 tang ting 上盖黄签：奉旨改：tak tik tak tik sembini。

该页内有夹条：乾隆二十七年(1762)十月十五日奉旨：“伐木丁丁”之清文 tang ting tang ting 四字着改 tak tik tak tik。钦此。

此修改之处为拟声词。因为夹着有修改意见的谕旨，应为乾隆皇帝钦定该处内容。对比乾隆三十三年武英殿刻本《诗经》中此处内容，与谕旨所改之处相同。

重译稿本之中，词汇修改与“新清语”有很多一致之处。乾隆三十三年《御制翻译诗经序》中表明“凡清文鉴所未赅哲者，参采新定国语”。“新定国语”已经成为满文重译汉文著作时修订词汇的重要依据了。

(三) 区别词义，选取恰当用词，使表达更准确

稿本中，修改用词时有很多词被替换为词义更贴近汉文原文的词。如《大学·第一分》有:

julgei genggiyen erdemu be

则近道矣 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

ambkai fejergi de genggiyeleki serengge .neneme gurun be

先治其国

dasambi .gurun be dasaki serengge .neneme boo be

欲治其国者 先齐其家

teksilembi .boo be teksileki serengge .neneme beyebe

欲齐其家者 先修其身

dasambi (拟改 tuwancihiyambi) .beyebe dasaki (拟改 tuwancihiyaki) serengge .neneme mejilen be tob.

欲修其身者 先正其心

天头黄签：“治”作 dasambi，“修”作 dasambi，似无分别。查《古文渊鉴》内有修治连用者，将“修”字翻作 dasambi，“治”字翻作 tuwancihiyambi。又查《清文鉴》ehe be sain obume halara be dasambi sembi .calabuha dašarabuha baita be inu obume dasara be tuwancihiyambi sembi.是 tuwancihiyambi. 清语与“修”字语意相符。今遵照《清文鉴》拟将“修”字改作 tuwancihiyambi. 文中因“修”与“治”用法的差别，引用原文进行比较，参考《古文渊鉴》和《清文鉴》，然后才选定用词。

《大学·第二分》内:

teni niyalma de baimbi (拟改 be hacihiyambi) beye de akū oho.

求诸人 无诸己

天头黄签：“求”作 baimbi，恐人认作“央求”字解。拟改 hacihiyambi.

manggi. teni niyalma be wakalembi (拟改 wakašambi) .

而后非诸人

天头黄签：“非”作 *wakalambi*，恐人认作“纠参”字解。拟改 *wakašambi*。

在浮签内清晰表述了修改的依据，便于皇帝阅读，也给后人留下了不可多得资料，让我们看到了修改译文的重要参考依据。

另外《大学·第一分》内有：

toktoho (朱改: *tokton ombi*) *manggi.teni teng seme* (鸿称通用 *cibsen*) *ome*。

定而后能静

天头黄签：《鸿称通用》“静”作 *cibsen*，今照改。

《鸿称通用》为解释帝后庙号、谥号、徽号及文武大臣官员谥封用字之工具书。全书共二卷，上卷为封谥帝后用字，下卷为封谥文武大臣官员用字。^{[5] (P203)} 在重译《四书》时《鸿称通用》所载用字是重要的参考和依据。仅《大学》3 件文稿中此书名就出现了 13 次之多。

(四) 添加解释性词语，使文意更清晰

对译文修改时在一些特定词语后添加了说明性词语，使词义更明了。如春秋时期国家名称后添加了“*gurun*”，地名添加了“*ba*”。对古代职官名称也添加了解释性词语。

如《论语》中有：

kungdzi (钦定成语 *fudzi*) *lu (+)* (拟添 *gurun*) *i taiši* (拟改 *aliha kumusi*) *de kumun be alame hendume*。

子语鲁太师乐曰

天头黄签：太师系掌乐之官。今拟作 *aliha kumusi*。

同文内有：

i (拟添 *ba*) *i fung zin* (拟改 *jasei hafan*) *acaki seme*

仪封人请见

天头黄签：封人系掌封疆之官。今拟作 *jasei hafan*。

lu 鲁，国家名称后添加了“*gurun* 国”一词，读者在译文中知道这是国家的名称。而“太师”从音译词中无法了解其职责，重译之后，我们便可从文中知道其为掌乐之官了。

再如《春秋·第一百七十三分》内有：

suduri (拟改 *koolingga*) *hafan joo* (拟改 *jao*) *hendume*

史赵曰

《清文总汇》内载：*koolingga* 有礼法。*koolingga hafan*，见《礼记》。祝史之史，乃事神官名。据此释义，*suduri hafan* 为史官，记录历史之官，与事神无关。修改之后所用词语，使该官职务更加明确，不致产生误解。

除上述之处，还有诸如部落名称、篇目名称等处也适当添加了说明性用词，使词义更加清晰。

(五) 根据文义拟造新词

四书五经本为汉文化属性范畴内的经典著作，并不在满族人民生活生产和意识形态范畴之内。很多词语满语中不能清晰表达。且四书五经为春秋时期作品，距清代两千至三千年，难字颇多。原满文译文中多用音译表达汉文文意。此次重译，在理解汉文原文的基础上，利用满文的已有语汇，拟造新词，来丰富表达。

如《礼记·卷之二十三》载：

neilebukū (黄签: 拟翻) *ejubukū* (黄签: 拟翻) *bihebi*。

有疑丞

天头黄签：谨查，古者天子必有四邻：前曰疑，后曰丞，左曰辅，右曰弼。天子有问无以对，责之疑。今将“疑”拟翻 neilebukū。可志而不志，责之丞。今将“丞”拟翻 ejebukū。是否允协，伏候训定。

再如《礼记卷之二十四》内有：

seibeni jung ni jorgocen (黄签：拟翻) de dahame wecere de

昔者仲尼与蜡宾

baita wajifi.

事毕

天头黄签：谨查，蜡，年终祭名。周曰蜡，秦曰腊。蜡也者，索也。岁十二月合聚万物而索飧也。今取 jorgon biyai wecen 之意。将“蜡”拟翻 jorgocen。是否允协，伏候训定。

《清文总汇》中收录了部分重译经典著作时的新拟词汇。此上三词就在其中，并且标明出处为《诗经》。

从天头黄签所注内容可知，所拟新词是根据词的意义，取相关满语文意，重新组合拼写而成。新拟词汇无疑丰富了满语的表达内容，也为满文词汇注入了新的信息。这些新词同时把汉语著作中的观念和意识形态也同时注入到了满语中。从中我们清晰地看到了语言交流对于文化信息传递的重要作用。

(六) 调整语气、语序，使语流连续

稿本对满文译文的厘定，除了词汇之外，对于满语的语气、语序也进行了必要的修改。如《春秋·第一百七十五分》：

acaha de terei jalin seme tucibuhengge akū (拟添 bime) ede terei jalin seme tucibuhengge adarame seci.

会未有言其所为者 此言所为何

句中添加了连词 bime 一词，汉意：而、而且，使原本单独的两句话连接起来，形成联合关系的并列复合句，使语句前后的关联更加清晰，语流更加连贯。

《大学·第一分》内有：

tuttu ofi ambasa saisa ten be baitarakū ba (拟改 baitalarakūngge) akū.

是故君子无所不用其极

天头黄签：baitarakū ba akū.语似赘。今拟改 baitalarakūngge akū.

修改后的译文用否定式的动名词形式表述了 baitarakū ba 两个词所表述的意义，与后面否定副词 akū 形成双从否定式，使语言更加简练。

再如《大学·第一分》：

nenden amaha be saha de doro de hanci ombi (朱改 oho kai).

知所先后 则近道矣

此句在满文的译文中增加了语气词，译文与汉文中语气更贴近。

原译文中语序受汉语影响不符合满语语序习惯之处，重译时对其进行了修改。如《下论语·第六分·季氏·第十六》内有：

kungdzi hendume nonggiburengge (朱改 nonggibure) ilan buyen (buyen ilan) ekiyenderengge (朱改 ekiyendere) ilan buyen (buyen ilan)

孔子曰 益者三友 损者三乐

ilan buyen 朱笔标划符号，将语序调整为 buyen ilan，更符合满语的语言习惯了。

稿本中除了词句等处修改之外，在修改过程中还特别注意保持用词、句法、语气等方面的一致性。

用词一致性, 如《大学·第二分》:

ši ging (钦定成语 irgebun i nomun) de henduhengge. eldengge ambalinggū (鸿称通用 umesi cibsonggo) wen wang

诗云 穆穆文王

天头黄签:《鸿称通用》“穆”作 cibsonggo。查《中庸》内“肫肫渊渊浩浩”等一字而叠用者,俱用 umesi 字样。今拟 cibsonggo 上加一 umesi 字样。

句法一致性, 如《大学·第一分》:

gunin be unenggi obuki serengge .neneme

欲诚其意者 先致

sara (朱改 sarasu) be akūmbumbi (钦定四书 de isibumbi) .sara (朱改 sarasu) be akūmbureangge (钦定四书 de isiburengge) .jaka be

其知 致知在格物

hafure de bi. jaka be hafuka manggi. same (拟改 sarangga 签上朱改 sarasu)

物格而后知至

天头黄签:“知至”二字与“意诚”“心正”“身修”等字俱系功效, 作 same isinambi。与“意诚”等功效句法似不合。今拟画一改 sarangga isinambi。

语气一致性, 如《大学·第二分》:

ginggunji bime olhoba eldengge (拟改 fing sembime hing sembi. fir sembime)

如磋 如琢如磨 瑟兮间兮 赫兮喧兮

天头黄签:“瑟兮间兮赫兮喧兮”四“兮”字似形容语气, 且“瑟”“间”作 ginggunji olhoba 而“恂慄”有作 ginggunji olhošoho, 字面亦似重复。今照形容语气拟将“瑟兮间兮”作 fing sembime hing sembi, “赫兮喧兮”作 fir sembime hoo sembi。似与下文“恂慄威仪”字面相照应。

引用已经翻译的著作内容时, 遵照原有译文, 以保持译文的一致性。如《大学·第一分》:

Ginggulehe eldengge bime ambalinggū(拟改 fir sembime hoo sembi) serengge . horon(拟改 arbungga) durun be.

赫兮喧兮者 威仪也

天头黄签:《中庸》内“威仪三千”之“威仪”作 arbungga durun。今此“威仪”拟画一照改。

《春秋·第一百七十一分》引用《易经》文中内容遵照了《易经》内的修改方式, 如:

i ging de bi (拟改 jijungge nomun i) fu guwe (遵照易经 dahūhan jijuhan) i

周易有之 在复

kūbulika ii guwe (遵照易经 ujibun jijuhan) de.henduhengge

之颐 曰

dahūre be falabumbi (遵照易经 de farfabumbi) .

迷复。

稿本内除了对满文译文进行重译外, 还对汉文有误或需要补充的地方进行了修订, 如《礼记·卷之十》:

ci gurun .han i gungju i sinagan be .

齐穀王姬之丧 (黄色浮签:“穀”当作“告”)

文中对汉文字误之处进行了修改。

《上论语·第十分·乡党·第十》内有:

tafukū wajiha

没阶

manggi .gardarangge ashai adali (拟改 gese) .

趋进 (拟去) 翼如也

天头黄签: 谨查, 注云: “没阶趋”之“趋”字下本无“进”字, 俗本有之, 误。再查《钦定四书》、《日讲四书》清文俱照注去“进”字为翻, 合并奏明。

可见, 对于四书五经进行重译时并没有只拘泥于满文译文, 为了翻译更加准确, 对汉文也进行了仔细校对。

四书五经重译的修改之处, 多用朱笔修改和粘贴浮签的方式。有的修改处贴有两张或者两张以上浮签, 签上内容直接反映了此处修改情况的变化。例如《中庸·第二分》:

ainci terei jobošohongge šumin ofi, tuttu gisurehengge goicuka (签一: 拟改 lakoho, 朱笔划掉, 左朱笔: akūnaha) (签二, 盖住前签和朱改: 奉旨重改 denggicuke)

盖其忧之也深, 故其言之也切。

gūnihangge goro ofi, tuttu leolehengge yongkiyaha (签一: 拟改 akūnaha, 朱笔圈划, 左朱笔: ketuken) (签二: 奉旨重改 akūnaha)

其虑之也远 故其说之也详

文中列举只是其中一小部分内容, 所述仅能展示其中一二。该重译稿本包含丰富的语料信息。对比满文原文和修订后的译文, 有助于了解清初与清中期满文的发展变化和满语规范化的渐变过程。

三、四书五经重译稿本的价值

清初以来, 历代典籍译成满文者, 可谓不胜枚举。大量的汉文典籍被译为满文, 打开了汉族历史悠久、蕴藏丰富的思想文化宝库。不少儒家经典和典章制度成为满洲贵族开国创业、治国施政的理论基础和制定方针、政策的依据, 在政治、军事、经济、法制、文化等方面具有广泛的影响。

清乾隆帝敕译四书五经, 是对原有满文译文的重新厘定。重译稿本以其详尽的语料反映了这一时期语言的变化。乾隆皇帝即位之初就意识到了满语文的使用不如以前的现实, 并且积极采取措施来修订新清语, 发布上谕推行, 力求最大限度保持民族语言发展的独立性。修订四书五经译本时, 就大量运用新清语, 替代满语中的汉语借词, 并在译文中规范满文语法。这一修订满文译文的方式, 成为后世修订满文的重要参考依据。咸丰六年殿刻本《大学衍义》为满汉合璧本, “翻译大学衍义上谕”称: “咸丰六年九月二十三日内阁奉上谕, 朕覆加披阅, 均系钦遵乾隆年间钦定四书五经通鉴, 各按新语, 详加厘定……”在咸丰时期满语满文虽然已经衰落了, 但是, 在修订满文译文时仍把乾隆朝钦定四书五经作为典范, 并按照新语进行厘定。

保持满语独立性的同时, 从稿本中词意的变化和新拟词汇中, 我们也看到了语言在文化交流过程中的开放性。典籍著作的翻译是文化交流的重要方式之一。反映到语言中, 会出现大量的借词, 以满足不同语言表达内容和方式的需要。词汇是语言体系中最活跃的元素之一, 也是语言里最容易发生变化的部分。在四书五经重译稿本中, 变化数量最大的就是词汇。通过译文的修改, 满语中增加了很多原本没有的词汇, 丰富了语言的表达方式。

乾隆皇帝统治时期, 清朝入主中原已经近百年。满汉文化交流在不断加深。四书五经的翻译本身就是文化交流的具体体现, 在其重译稿本中, 也反映了文化交流的不断深入。从四书五经的重译稿本中, 我们清晰地看到, 说满语的人对于四书五经的理解更加深入, 原有译文不清晰不准确之处突显出来。修改译文时, 一些原本汉文化中的观念也在满文中体现出来。在《论语》中, 原有译文

将“子曰”译作“kungzi i henduhe”，重译稿本修改之后和乾隆二十年《御制翻译四书》中则将“子曰”改译为“fudzi hendume”，将“孔子”改为“夫子”，以示恭敬。在《春秋》中“文王”的“wen wang”均被改译为“wen wang han”。尧舜等名称之后也添加了“han 汗”，在语言上强调了地位的尊崇。

清统治者吸取中原封建王朝统治经验，加速了满族社会的封建化进程。翻译汉文典籍，成为吸取统治经验和传播统治观念的重要方式。四书五经重译后，经武英殿刊印发行。此后各朝并没有再对四书五经满文译文进行修改。

乾隆朝四书五经的重译稿本，无论从版本的独特性，还是语料的丰富性，都称得上是难得一见的珍贵文献。它记录和保存了大量满语满文在清中期变化的详细信息，反映了清代前期和中期满文变化的情况，是研究满语满文发展史的重要参考资料。

注 释：

①该稿本藏于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资料室古籍室。

②文内引用稿本文字内容和修改内容，遵照原文行格和满汉对应方式。下划线所标注为被修改内容，后面括号内为浮签所改内容，朱笔修改部分在括号内以文字标明。

参考文献：

- [1] 庄吉发. 清史论集(四) [C]. 台北: 文史哲出版社印行, 2000.
- [2]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官中全宗满文杂件. 全宗号 04. 卷号 291 ~ 304.
- [3] 张虹、程大鲲. 乾隆朝钦定新清语(四) [J]. 满语研究, 1996(2).
- [4]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 乾隆朝上谕档(第2册) [M]. 北京: 档案出版社, 1991.
- [5] 屈六生、黄润华. 全国满文图书资料联合目录[Z]. 北京: 书目文献出版社, 1991.

作者简介：

徐莉，女，满族，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满文处馆员。主要研究方向：满文档案及文献研究。